

1972年，17岁的刘建设在学校成绩平平，眼看着读书读不出来，被父亲叫来生产队，跟着村里老师傅，参与到卢舍那大佛的抢险中。在他的记忆里，那时的卢舍那大佛简直惨烈，头顶肉髻、身体都有窟窿。从发际线到左脸下颌，一条约10厘米的裂隙贯穿，左鼻翼和嘴唇还各有缺失，右臂摇摇欲坠。南壁西侧的天王像，胸部雕刻崩落在地，需要吊装归位粘连。

这一点也得到了著名的石窟保护专家刘景龙的印证。上世纪60年代末，刘景龙记得当时的卢舍那大佛左脸已经有长长的裂缝，而南侧的天王与力士更是危急，躯体残存，和背后的岩体之间还有20厘米左右的裂隙，全部脱离山体后坠落的险情，可能随时发生。

最终历时四年，卢舍那在内的奉先寺“重获新生”，佛像的安全稳定有了明显改善。四年里，有20根锚杆用于卢舍那大佛的加固，灌浆量达到1200公斤。

自近代以来，龙门石窟的命运充满曲折。距今50年前那次大修，在如今看来成为一处拐点。从20世纪初，直到70年代大修前，龙门石窟命运多舛。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，石窟被大规模破坏、盗凿，大批造像流散在外。追回这些佛像的路，至今仍在持续。

准确地说，龙门石窟文物被西方觊觎，始于1907年之后。在那一年，有一位日后成为知名汉学家的法国人——爱德华·沙畹，不远万里来到东方，先到沈阳，然后由东向西，一路穿过河南，最终到达西安。

沙畹回到巴黎后，编成《华北访古记》。历史的一面是，沙畹的

手稿和图片在学术上贡献很大，为后来中国考古提供了重要参考；然而另一面是，这些珍贵的图文资料，刺激了当时的西方人盗掠龙门石窟。

有人看中《华北访古记》呈现的龙门文物后，找到中国的古玩商人，开出高价。这些古玩商人“接单”后，再伙同龙门当地的石匠，将造像偷凿，通常先运往郑州，再到北京，最后转运出海。

20世纪30年代初，地质学家袁同礼到龙门石窟考察，看到了宾阳洞、千佛洞等洞窟被严重毁坏。洞窟内的佛像头颅被击落，洞内外佛龛造像或被砍头，或全身被盗。惨状触目惊心。他在考察报告中提到：龙门之南的外凹村，许多石匠都以盗凿龙门石像为业。石匠勾结土匪，夜里携带云梯、手电筒到洞窟中盗凿。过不了多久，被凿下的佛像、碑刻、浮雕就会出现在北京的文物市场上。

这些被凿下的文物，最终流向了世界各地。美国堪萨斯市纳尔逊艺术博物馆、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，以及日本大阪与京都的博物馆里，现在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。目前已知流散在海外的龙门石窟佛像多达200件以上，实际数字难以估量。

令人唏嘘的是，龙门周围的村落，不少以石匠为祖业。龙门昔日被盗凿是石匠村，后来对其进行修复的人，大多也来自石匠村。龙门石窟的命运，与周边村民的生计，在岁月变迁中不断碰撞。

少年石匠

公元493年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下令迁都洛阳。致力于改革的孝文帝，

同时开启文化建树：大批能工巧匠被征召，他们来到风水极好的伊阙。

叮叮咣咣，一场声势浩大、跨越多个朝代的皇家开窟造像揭开序幕。

伊水中流，两岸山体对峙，呈天然门阙奇观。所以石窟建造最初，当地被叫作伊阙。公元604年，隋炀帝杨广登基。当他登上洛阳北面的邙山，南望伊阙，只见两山相对，其间伊水穿流而来，远望犹如一座门阙，不禁感叹“真龙天子之门户”在此。第二年，杨广营建洛阳为东都，伊阙从此被称为“龙门”。

1961年，龙门石窟经国务院批准，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当年，世界遗产委员会评审会议对其评价为：龙门地区的石窟和佛龛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（公元493—907年）期间，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。

老刘永远忘不了7岁时第一次到石窟，见到卢舍那大佛的样子。身高17.14米的大佛，在儿童的记忆里，“就像一座山”。当时他不会预料到，自己未来的人生会与大佛以及其他佛像紧紧连在一起。

我在龙门石窟莲花洞见到老刘时，他戴着红色工帽，穿着黑色的棉

下图：伊水河畔。

